

◀ (上接4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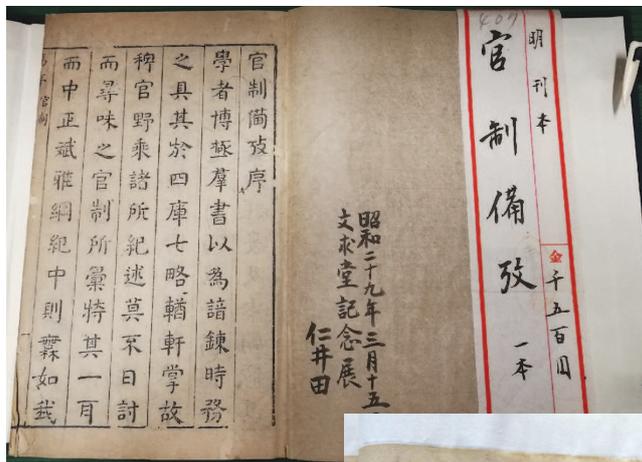
堂位于本乡一丁目，“本乡鬼谷子”自然也就是整个本乡地区的学术预言家。一有大学生到店里来，田中氏就会当着学生的面，将东京大学或是京都大学的学者们严厉批判一番，并对学问无休止地说教。学生很愿意聆听这样带着火气的说教，东京都立大学教授松枝茂夫1927年在东大读书的时候，经常与同系的竹内好、增田涉一起到文求堂“受虐”——“愿意像被痛打一样地被他教，而且是每天都要去”（《怀念文求堂主人》，《朝日新闻》1966年5月22日）。

年轻人在文求堂“被虐”一番之后，还是会翻翻主人最新从中国进口的学术书刊，虽然囊中羞涩，隔三差五也会购书若干。不同于传统的旧书店，文求堂的书架一半是古本汉籍，一半是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新刊书。这种新旧夹杂的陈列方式贯彻着田中氏的经营策略——“如果只卖汉籍古本，就只有不是学者的高龄老人来光顾，年轻人不会来；如果招不来年轻人，其结果也就是丧失了

未来的购买群。”（《汉籍书店的变迁》，高田时雄、刘玉才整理《文求堂书目》第16册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）抓住年轻人的研究动向，投资他们的未来，这才是“本乡鬼谷子”绰号的本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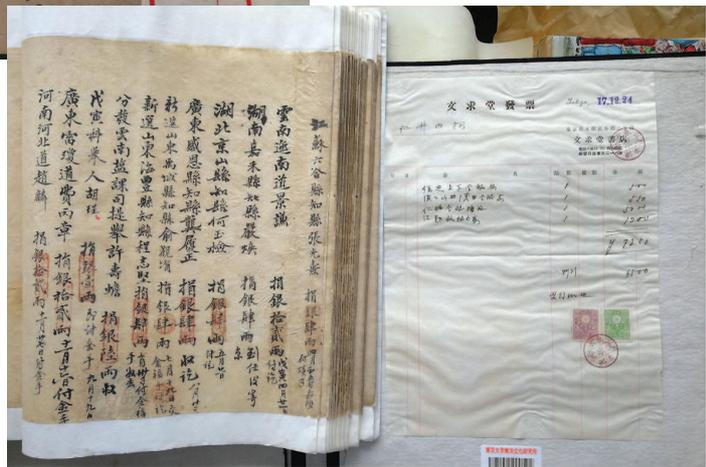
田中氏说，当时汉籍书店出售的“许多都是与中国近代性学问无关的书籍，其结果，就是引导读者对于诗文和中国趣味的追求”（《汉籍书店的变迁》）。开一家充满汉学情怀的“怀古旧书店”，从来不是田中氏的目标，他也因此和传统的汉学家“气味不相投”。

长泽规矩也很少在文求堂碰到自己学部的老师。“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哲学、文学的先生们，就我所知，差不多都不登文求堂的门。像服部博士就是那样，宇野博士是那样，盐谷博士也是那样。主人也对先生们的评价较低。东洋史的先生们常能见到。其中，首先是市村瓚次郎博士，然后是和田清博士。”（长泽规矩也《与古书店主的交往》）这里提到的服部宇之吉、宇野哲人、盐谷温，可都是大正昭和时期的汉学领袖、随



◀ 仁井田陞购于文求堂即卖会的古籍——明刊本《官制備考》，一千五百日元，1953年3月15日

▶ 东京大学“仁井田文库”所藏《嘉庆庚午至道光壬辰钱会馆捐册》，书套贴有1942年仁井田先生购于文求堂的书籍发票



便一签就是数千元购书单的东方文化学院院长，可是文求堂主人将他们视作传统儒学和文学的老先生，评价较低，一并将他们所代表的专业放在“学科鄙视链”的最末端。

东洋史界的教授们反而与文求堂交往较多。田中氏最为敬畏的是京都学派的领袖内藤湖南，常常把最好的版本留给内藤。内藤氏在1932年一次公开演讲中，还借田中氏暗贬了东京同行：“在今日的东京学者中，无人能与文求堂主人的古书鉴赏能力相匹敌。”（内藤湖南《宋元版の語》，收入《目睹书谭》，东京弘文堂1949年版，第330页）当时的研究风气，东京的儒学文学老先生不太看重版本目录学，反倒是白鸟库吉、市村瓚次郎、池内宏、加藤繁、和田清等一批后来被称为“东京文献学派”的东洋史学者，常常到文求堂购书和交流古本心得。

明治时代末期，白鸟库吉（1865—1942）领军的东洋史学在边疆史地领域突飞猛进，有意识地搜集明清的四镇三关志等方志文献。1900年到1911年之间，田中氏每年来到中国搜书，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替东洋史学者搜求冷门的地方志。孙殿起《琉璃厂小志》有一段“日本书商来京搜书情形”专述田中氏：“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，清光绪末叶，每年必至我国北京，搜罗书画法帖一次或两次。……是时我国学者，多喜读集部书，故对于府州县志，无人过问；厂肆志书，多被他人买去。普通本以罗计，每罗一文明杖高，仅售现银一圆。”这些田中氏以手杖为计

价单位、低价捆载东去的地方志书，回国之后以几倍的价格售与东京大学、东洋文库。

1910年代，文求堂书店的成长期，也是中国、日本、西洋的汉学研究“突进期”，敦煌文献、青铜铭文、甲骨文、小说戏曲、地方志等等新文献的涌现，推动了新学术的勃兴。注重搜集新文献材料的实学研究，成为各个学科的前沿趋势。文求堂主人田中氏因势利导，在日本书店中，率先将怀古性的古本放在第二位，而把代表学术发展方向的汉籍放在第一位。“学术日进，清楚地认清将来的研究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，是最必要的。在此基础上，购买搜集那些将成为研究资料的书籍，然后，把这些书籍提供给书业界，就必然会有研究者来买。”（《汉籍书店的变迁》）

如此说来，仁井田陞的学问起跑阶段，恰恰反映了日本大正至昭和初期的学术潮流。他先是在初中老师、同时也是东洋史研究新锐的和田清的影响下，对于文献版本有了认识。到了本科阶段，正如《求母》之刊名所揭示的，他开始返本复初，希望探求文献的“本来面目”。可是，“昭和时代一开始，也就是1920年代后半期，在东京大学法学部攻读的学生，千人之中也没有一人是想要研究中国古书的。教学之中，没有一位教授参考了中国的古书。要研究古书版本，只能独自去干。”（仁井田陞《文求堂和我》）幸运的是，文求堂主人把整个书店的藏书向仁井田敞开。拥有全东京最好的古本鉴别眼力的田中氏、明清史料开拓者和田清，二位前辈对于仁井田陞

的点拨与助力，犹如周伯通、洪七公之于郭靖，让“完美结合了学问的热情与毅力”（《东方学》第78辑“仁井田陞纪念座谈会”）的年轻小子，一下站在世界学术的最前沿。

文求堂书店在仁井田陞的学术道路上，意义不仅在于作为他接触古籍的“古书馆”；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所揭示的学科鄙视链，更是让十字路口的仁井田确定了未来方向。1951年田中氏因病辞世，长子乾郎亦于1953年去世，经营了四代人的文求堂不得不在1954年3月歇业。闭店前，文求堂举行了一次古书展览即卖会，库存图书“在库一扫”。仁井田在即卖会上买了好几本古书，其中的明刊本《官制備考》以1500日元买下，现为文库的特别贵重书。回来之后，心情沉重的仁井田陞，写下了一篇深情压在纸背的《文求堂和我》。

1966年，仁井田陞在伦敦讲学时不幸病倒，回国后溘然长世。他的藏书悉数捐给东洋文化研究所，即今日“仁井田文库”之库藏。在仁井田文库所藏法律古籍、日用类书、家谱等汉籍之中，偶尔会看到文求堂书店开具的“发票”，仁井田先生将它们贴在书套封内。

“大量地经营家谱、法律文书等等也是从文求堂首先开始的。”（仁井田陞《文求堂和我》）一个世纪前的学术潮流，还有学人与书店之间的情谊，就这样再现眼前。

（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员）



1910年，时年三十的文求堂主人——田中庆太郎



位于东京本乡的文求堂书店，1927年